

中外翻译文化交流史丛书 名誉主编 尹承东 范岳

中日翻译文化交流史

A History of Interflow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Translating Culture

于丽萍 撰

辽宁大学出版社

辽宁大学亚洲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中日翻译文化交流史

于丽萍 撰

辽宁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日翻译文化交流史/于丽萍撰. —沈阳: 辽宁
大学出版社, 2016. 11

(中外翻译文化交流史丛书)

ISBN 978-7-5610-8416-8

I. ①中… II. ①于… III. ①中日关系—翻译事业—
文化交流—文化史 IV. ①H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64030 号

出 版 者: 辽宁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110036)

印 刷 者: 沈阳市第二市政建设工程公司印刷厂

发 行 者: 辽宁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幅面尺寸: 160mm×230mm

印 张: 26

字 数: 470 千字

出版时间: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陈景泓

封面设计: 憬 鸿

责任校对: 何 跃

书 号: ISBN 978-7-5610-8416-8

定 价: 90.00 元

联系电话: 024-86864613

邮购热线: 024-86830665

网 址: <http://press.lnu.edu.cn>

电子邮件: lnupress@vip.163.com

总 序

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家、中国资深翻译家、辽宁省首届唯一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宋韵声译审主编并审定的《中外翻译文化交流史》丛书即将由辽宁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发行，其各册书分别为：《中日翻译文化交流史》《中英翻译文化交流史》《中美翻译文化交流史》《中俄翻译文化交流史》《中德翻译文化交流史》《中法翻译文化交流史》《中拉翻译文化交流史》《中非翻译文化交流史》。

我们认为，这套丛书很可能会成为中国翻译文化领域乃至世界翻译文化领域的一种具有开拓性和指导性的参考用书。因为此前关于这方面的著述尚无人问津。

翻译是一种大文化，是世界文化、国家文化和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统称之为翻译文化。翻译文化的研究并不是从翻译文本或翻译过程等某种单一的翻译形式入手进行孤立的研究，而是要把翻译置于大文化研究系统之中，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而深入的理论性和综合性研究。

翻译文化在促进民族之间交往和社会文明发展的过程中的价值和作用，乃是一种文化常识，毋须在此赘述。但对于中世纪拉丁文化对希腊文化的翻译引进、斯拉夫文化对拉丁文化的翻译引进、中国汉文化对印度佛教文化的翻译引进、日本和文化对中国汉文化的翻译引进等，都构成了人类文化史上时间相当持久、影

响相当深远的重大文化转移动向，也因此改变了世界文化的格局，扩大了先进文化的普及面，从而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也正是由于翻译工作的这种巨大能量，我们才认为有必要重申一下史实的。

在近一两个世纪的东西方文化接触、碰撞、彼此吸收、乃至融合的频繁交流中，翻译文化所显示的威力极大。在国际社会所谓的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究其实质是在东西方文化交汇中，通过大量翻译实践而产生的文化渗透和文化影响。如果没有翻译做为媒介，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就是一句空话。

中华民族是世界民族之林中的一株巨柏，它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的文化令全人类瞩目。基于世界上几百个国家和上千个民族对中华民族文化了解和欣赏的愿望，他们用自己的民族文字翻译了大量的汉语典籍，其数量多得难以统计。甚至多到一部中国书籍在一些民族语言中就能找到上百种不同的译本。对于我国的翻译界来说，情况也大体如此。一些西方名著，有几种或几十种汉译本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这种现象或者称之为趋势，很可能是翻译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既然翻译文化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已经繁荣昌盛到了如此地步，我们认为，及早地对中外翻译文化交流的发展历程进行历史性的回顾和逆时追踪，经过疏理和总结，撰写出一套中国与异域翻译文化双向交流的史书，应该说是中国译界史学家的一种义不容辞的使命。实际上，本套丛书的编撰者，也正是本着这种思考和使命感而“双肩担道义，一手著文章”的。

中国的翻译文化，虽说断断续续已有上千年的历史，但真正意义上的翻译文化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才迅速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成立伊始，党和政府高瞻远瞩，把翻译事业纳入文化建设和国策的高度来对待，成立由党中央直接

领导的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和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1951年11月6日，国家出版总署在北京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工作会议，大会主题报告是《为翻译工作的计划化和提高质量而斗争》；1954年8月，中国作家协会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在会议上文化部部长兼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茅盾先生做了题为《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总结报告，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翻译工作的纲领性文件。从此，中国的翻译事业走上了有组织、有计划、有规模的发展轨道。中国也以翻译大国的形象展现在世界的文化舞台上。

诚然，世界许多国家都出版过自己民族文化的翻译史或国别翻译史，但未见专门的翻译文化交流史，尤其是以双向交流的形式书写的翻译文化交流史。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翻译文化对世界翻译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是举世公认的。作为记录和追述国际间翻译文化交流的历程，该套丛书以中国翻译为中心、以向外辐射形式撰写中外翻译文化交流的模式是一项创举，它不仅汇集了中国学者总结出的中国与世界各国翻译文化交流的成果，也彰显了中国翻译文化事业研究的积淀与人才储备。

辽宁文化界很重视翻译团体和组织建设，在几十年的学术活动中，有三大翻译学术团体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一，辽宁省翻译学会，成立于1983年，是国内知名度较高的民间学术团体。其二，辽宁省作家协会中外文化交流委员会，成立于1990年，是辽宁省翻译界培养新型人才的基地。其三，东北亚语言、文学与翻译国际学术论坛，始建于2008年。它是立足于东北亚，旨在促进本地区和本地区与其他区域之间学术交流与合作的国际学术平台，现已召开过五届大会，具有一定的国际影响。会议论文

进入国际著名的 CPCI—SSH 引文数据库。

《中外翻译文化交流史》丛书，正是这三大翻译学术团体联合规划推出的重点出版项目。我们相信，这八册（约 400 万字）丛书的出版，将可与五卷本的“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翻译通史》（400 万字）和六册的“十一五”国家重点出版规划项目《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200 万字）相提并论。

我们正在成长的一代翻译家已逐渐成为大国文化工匠。

东北亚语言、文学与翻译国际学术论坛主席

尹承东 范岳

2016 年 10 月 22 日于大连

目 录

总 论	1
第一编 近代中日翻译文化交流	
第一章 近代中国的日语翻译文化	16
第一节 近代中国日语科学书籍的翻译	21
第二节 近代中国日语文学书籍的翻译	45
第二章 近代日本的汉语翻译文化	64
第一节 近代日本汉语科学书籍的翻译	69
第二节 近代日本汉语文学书籍的翻译	77
第二编 现当代中日翻译文化交流	
第一章 现当代中国的日语翻译文化	90
第一节 现当代中国日语科学书籍的翻译	97
第二节 现当代中国日语文学书籍的翻译	188
第二章 现当代日本的汉语翻译文化	300
第一节 现当代日本汉语科学书籍的翻译	319
第二节 现当代日本汉语文学书籍的翻译	354
主要参考书目	404

总 论

1

文化，通常是指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在某种意义上讲，文化史接近人类发展史，至少是人类社会历史的最主要部分。从狭义上讲，文化一词，多偏用于精神财富方面。甚至一些非常具体而成形的东西，要属于精神财富方面，也只能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是一种意识形态，主要包括文学、艺术、宗教、法律、道德伦理、教育、科学等方面。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各个民族在不同地域、政治、经济、民俗等方面的反映。反过来，文化的存在形式又给社会以巨大的影响。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带有强烈的民族特征。比如，一个民族的语言、信仰、传统以及生活方式等，都是一个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以此有别于其他民族。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悠久的灿烂文化，而且各民族文化都有自己的特点。作为国家，由于政体或经济的差异，可有先进与落后之分，但作为民族文化就没有优秀与低劣之分。它们之间的不同就是各具特色，而其特色就是差异。一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能存活下去，就充分说明该民族的文化具有促使这个民族发展、前进的优点和力量。

本书要研究的不是单纯某个民族的文化史，而是具体到两个东方民族——中华民族与日本民族的文化交流史中最关键的部分——中日翻译文化交流史。尽管是中日文化交流中的一部分，但其年代之长久，范围之广泛，涉及内容之多，影响之大，对于这两个民族，乃至世界文化的交流，都不容小觑。

文化与人类是密不可分的，是同生同在的。没有文化的人类与没有人类的文化，同样都是不可思议的。但人类自觉研究文化的历史并不长。中国是世界上文化比较悠久的民族，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超过 3000 年。但中国人真正把文化当做一门科学来研究，还是“五四”以后的事情。西方把文化作

为专门科学来研究始于近代。1843年，德国学者C·E·克莱姆著的《普通文化史》当是西方文化研究的滥觞。

西方的文化学也叫文化人类学。因之，文化学的范围极其广泛，可以说是无所不包。正是由于文化学涉及范围广，分支繁多，才使这门科学难以定型的，但它的基本涵义还是清楚而明确的。

文化研究基本上从三个方面加以研究，即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本书正如前述，是以后者为叙述与研究的主体，并以翻译交流的形式展开。

另外，由于本书是站在中国的角度、以中国人的观点，由中国人来撰写的著作，所以，为了节省篇幅和避免累赘，在谈文化的时候，除了作为比较和对照之外，我们尽量少谈中国文化。关于这种初衷，我们想读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不等于我们在谈中日翻译文化交流的历史中，有主有次，有轻有重。尽管这种交流是双向的。

日本位于亚洲东部，在地质发展史上，远古时代与亚洲大陆连在一起，在地质年代的新生代，即八千或一百万年前，日本还和亚洲大陆尚未完全分开，它的南北两端还与亚洲大陆相连。后来，由于地球的一次激烈变动，才使日本和亚洲大陆彻底分离，形成一个四周环海的岛国。从此，日本人开始走上独自创造历史的发展道路。

日本人的原始文化，通常是指日本的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文化。从时间上看，跨度很大，早在什么时候，难以判断，但下限约到公元前300年。

日本的原始文化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神秘性。这种神秘性来自万物有灵的观念，其文化母体是幻象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具有普遍性，即是说这种思维方式是一切民族思维方式发展的必经阶段。可以说人类思维及思维方式的发展都必须经过这样一个阶段。日本原始文化的神秘性，后来转化成为迷信的“神道”。

日本原始居民广泛存在着对大自然的崇拜。他们认为万物都有神，不但认为有日神、月神，还认为有山神、河神、猪神、狗神等等。他们不但认为这些东西有灵魂，而且还能给人类带来福祸，因而许多民族以这些东西为图腾。他们想象出人与他们的各种各样的关系以及他们的形象，不管他们在现实中存在与否。这样，也就难以避免走进神秘的世界。

日本人在新石器时期，是女神成群的世界。考古发掘出的陶俑不但都是女性，而且女神们的形象千姿百态，为人们的心灵罩上神秘的纱笼。日本的原始居民中有不少跳大神的女巫。这是由文化高于当时日本土著居民的通古人带过去的。当时西伯利亚以及中国东北、黑龙江下游的以渔猎为生的通

古斯人把他们的原始宗教——萨满教传到了日本，致使日本后来的宗教观、神道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萨满教的特征，并且经久不失。日本的天照大神不仅是女的，而且还是他们的始祖神。女巫在日本原始时代有很大的权威，甚至身为国王的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就是一位女巫。

2

被大海隔开后的日本，究竟从什么时候又与大陆建立联系，再次回到大陆文化中来，不可确知。东汉王充著的《论衡》中说：“周成王时，倭人献鬯草。”此话如果确实，就表明在公元前 11 世纪末到前 10 世纪初，日本就与中国有了联系。但这话缺乏佐证。

日本学者木宫泰彦在著作《日中文化交流史》中引用内田银藏的话说：“海洋固然一方面可把国家和国家隔开，但同时还可把国家和国家结合起来。”因为海洋也是一种通道，即所谓水路。在造船技术还没有发展起来，航海技术还未掌握的年代，日本与大陆的中国虽说一衣带水，可至少有几千年的时间成为难以逾越的鸿沟。

究竟是中国人乘船先到达日本，还是日本人乘船先到达中国大陆，历史没有明文记载。但据推测恐怕还是中国人首先登上日本岛国。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短短 12 年中，曾三次巡视山东滨海城镇琅琊。琅琊当时正是秦方士徐福活动的主要地区，他曾两次在琅琊晋见秦始皇。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 28 年（公元前 219 年），秦始皇率领文武百官东巡琅琊，“齐人徐福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州，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童女求之。于是遣徐福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这次入海绕山东半岛，去庙岛群岛，沿辽东半岛西岸东行，过鸭绿江口，沿朝鲜半岛西岸南行，经济州岛，至日本北九州。这一条北方沿岸航线，诸岛相望，便于补充淡水和避风，航行比较安全。公元七世纪以前，一直是汉魏隋唐时期中日交往的通道。

徐福第一次出海回来后，《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 37 年（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又率文武百官巡视琅琊，在此又见到了徐福。徐福花费了大量资财没有采到仙药害怕降罪，便谎说为海中大鲛鱼所阻，故无法得到不死药，请求配备弓箭手再次入海。可能是到达日本海岸后遭遇土著抵抗，回来寻求武装。秦始皇答应了徐福的请求，“乃令人海者赍捕巨鱼具，而自以连弩候大鱼出射之。”并与徐福等一起乘船北上，“自琅琊北至荣成山，弗见。至芝罘，见巨鱼，射杀一鱼。”秦始皇这才放了心，认为把大鱼射死，是为徐福入海采药扫清了道路，遂回返。徐福再次东渡。

据传说，日本九州佐贺县是徐福第二次东渡最先登陆的地方，他在佐贺留居9年，又沿濑户内海东迁，至熊野山定居。

徐福又名徐市，山东琅琊（今山东胶南市）人，秦方士，生于齐王建十年（公元前255年）。幼读儒书，研习阴阳五行，修真炼丹，修仙学道，聪明过人。成年后随父徐猛宦游齐国，与齐国方士侯生、燕国方士卢生均为至交。他们不满秦始皇刚愎自用，反对他用武力征服六国。遂以给秦始皇求仙采药为名，谋术摆脱秦朝统治的一种隐蔽手段。

在日本，人们认为徐福是把中国大陆先进文化、先进技术带到日本的圣贤。他教日本人种植水稻、捕获鲸鱼、栽桑养蚕、纺线织布、采药治病等等。日本民间尊徐福为农耕神、蚕桑神和医药神。徐福东渡，也必然带去了当时齐国的原始宗教信仰，齐人所信奉的八神主，在日本开国神话中都能找出来。1980年，佐贺县金立山麓出土一件2000多年前的中国大陆烧制的陶器，里面还藏有已经炭化的谷种。当地人说那是徐福一行带去的遗物。关于徐福，在日本民间有许多美好的传说，在不少地方建有纪念徐福的墓、祠、碑和神社。徐福可谓是中日人民友好和文化交流最早的使者。

徐福东渡是历史上一次伟大的航海活动，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航行早1700多年。哥伦布仅率领90人乘三条帆船去美洲，而徐福是乘几十艘大楼船，率领数千人去的日本，应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创举。

汉朝以后，中日交往屡见史籍。例如《后汉书·东夷传》上即有“光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受”的记载。其后《魏志·倭人传》上载日本女王卑弥呼先后于公元239年及243年两次遣使朝贡。又据《晋书》等记载，公元266年日本女王壻与曾派遣由20人组成的使团来朝。特别是南朝的《宋书》上载，自公元413年至502年，日本的讚、珍、济、兴、武五王（即《日本书纪》所载的仁德、反正、允恭、安康、雄略天皇）先后13次遣使朝贡。这些使节来朝，只是一般的修好，并不是有政治的或文化交流的意义。但自公元600年迄614年间，日本派出的遣隋使则具有政治目的和文化使命，而随派留学生和留学僧的第三次遣隋使，是日本直接向中国全面汲取文明的嚆矢，亦是以后规模巨大的遣唐使的前奏，从而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

迨唐继隋而兴，国力隆盛。通过四次派使遣隋，日本在初步接触到中国的优秀文化并有吸收之后，对中国文化益加赞叹憧憬，朝野上下醉心于学习模仿。形成一狂热学习中国的高潮。

据文献记载，到中唐时居住在长安的外国人达4000多，其中大多为中亚细亚各国的商人。长安设有国子监、太学、四门学、律学、算学、书学六

种培养人才的学校，规模宏大。亚洲各国派来学习的学生，多是进长安的太学，每年约有五六百人。对于留学生，唐朝政府都给予助学金。日本朝廷对这种盛况如何能视而不见，这是日本派遣大批留学生、留学僧的大好时机。

公元630至894年的264年间，日本遣唐使派任19次。遣唐使在中日交往史上之所以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不仅因为它规模大、次数多、历时长，更因为它给日本带回文明古国的榜样，从物质到精神给日本朝野注入了新的活力，为以后乃至今天日本的辉煌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中日两国友好往来谱写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篇章。

遣唐留学生、留学僧对日本文化和宗教的贡献是相当巨大的。遣唐留学生长期生活在中国社会之中，从生活中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对唐朝的各种风俗习惯自不免有所感染而移植于日本本土。另外，大量汉籍图书输入日本，除遣唐使外，主要应归功于遣唐留学生。遣唐留学生移植盛唐文明、提高日本文化水平所做的贡献也是巨大的。

佛教传入日本始于钦明天皇十三年（公元543年）。当时已有中国人司马达等渡海抵日，设立佛堂于大和的坂田原，安置佛像，供人膜拜。但至唐而趋极盛。随着唐朝朝廷重视佛教，特别是武则天利用它作为篡唐改周的精神武器，日本皇廷也亦步亦趋从单纯信仰而着眼于为政治服务，两者一拍即合，绝非偶然。日本遣唐留学僧不仅为日本输入了佛教的各种流派，且亦携带回国许多佛经、佛缘、佛画、佛具等，为弘扬佛教文化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日本通过遣唐使团从中国取得多方面的丰硕成果，在这其中有部分中国人，包括官吏、学者、高僧等都起过特殊的作用，做出过重要贡献。为中日两国长期友好往来的历史谱写了光辉的诗篇。

3

人们通常认为日本引进了中国的汉字，其实也引进了汉文和汉文化。公元284年中国人王仁赴日带去了《论语》和《千字文》，日本皇太子菟道稚郎子师事王仁，跟他学《论语》和《千字文》，这即是汉字传入日本之始，也是汉文传入日本之始。尽管汉字和汉文传入日本很早，然而日本人绝大多数不能驾驭汉字和汉文。因此，在当时宫廷中掌握文书和出纳的官员大多是汉人。日本人出现能掌握汉字和汉文的人才是中国隋唐时代的事情。这个时代是日本人才备出又大量被派到中国来学习的时代。尤其重要的是，这些高级人才在熟悉了汉字之后，充分利用汉字做基础，创造了日本民族的文字。写成于8世纪中叶的日本古代诗歌集《万叶集》里采用了许多汉字标日语音的情况。这种方法很快被人们采用，并在汉字标日语读音的同时，有人反

倒用日语注汉字，用黑色或粉红色将日语小写到汉字旁边。这便出现了“万叶假名”。这种“万叶假名”即忽略了汉字原有的字义，是利用汉字的音读和训读标记日语。万叶假名并非只用于《万叶集》，因为这种文字标记方法在《万叶集》中颇为多见，而且《万叶集》中的用法又具有代表性，所以才得此名。

尔后，汉字汉文不断流入日本，汉字经过整理，进入《康熙字典》的汉字有49,000多字，这些字也大都为日本人所用。日本根据汉字创造假名的过程，实际上是汉字日本化的过程。日本除了假名文字之外，还有仿造的为中国所没有的汉字，但数量极少。

日本人不愧是以文化立国的民族，他们能把世人认为最难掌握的汉字逐渐日本化，创造出自己的文字，这对日本文化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意义。新创造的日本文字不但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结果，而且也是日本后来进一步吸收中国及世界文化的工具。

尽管汉字输入日本的时间很早，但汉字日本化的过程直到8世纪末或9世纪初才完成。在此之前，日本人多用汉文著书立说。日本最早的史书出现于8世纪初。太安万侶所撰《日本书纪》完全是用汉文撰写的。直到德川幕府时代，以汉文写史之风仍未衰退。使用汉文的日本人，必须深刻地理解和掌握中国文化，而且还要在使用过程中创造出独特的本民族文化。

中国的隋唐时期既是汉文化大量输入日本的时代，也是中国的典籍大量流入日本的时代。从中国大量输入书籍，成了日本引进中国文化的重要方式。北宋166年间，中国文化再度繁荣，彪炳史册的唐宋八大家，多是宋朝人，周、张、程、朱，开新儒学先河，日本再次掀起引进中国文化的高潮。公元983年（永观元年），日本法济大师裔然入宋，参拜天台，进汴京，受到宋太宗接见，献《日本年代纪》和《职员令》，使中国确知了日本皇室谱系和二官八省制度。

南宋以来，由于商船来往更加频繁，入宋僧也有所增多。这时入宋僧人与北宋时期有些不同，他们除继续研究佛教禅学外，还比较注重儒学新理论。有元一代，到中国来的僧人不亚于两宋，但他们多输入佛典，对其他典籍不感兴趣。这时日本社会研读汉籍的人，则通过商品贸易直接从中国购买。书目很多，常见的有《毛诗》《尚书》《周易》《礼记》《左传》《周礼》《公羊传》《论语》《孝经》《老子》《列子》《庄子》《史记》《前汉书》《后汉书》《荀子》《墨子》《孙子》《吕氏春秋》《战国策》《山海经》《尔雅》《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广韵》等几百种。

明清之际入华僧人多专注于佛事，少问旁门学问。但明清时期东渡日本

的僧人和学者络绎不绝，对传播中国文化和对日本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总之，自隋唐日本引进中国文字和文化之后，中国典籍输入日本不计其数，几乎中国所有的书籍日本都有。后来中国失传的书籍，日本仍有。

在人类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中，人们往往多注意先进地区的文化流向后进区域，对于后进地区的文化流向先进地区的现象多被忽视。中日文化交流就存在这种现象。究其原因主要是文化先进区流入后进区的现象太多，而文化后进区流向先进区的现象甚少几乎少到不成比例。此外便是社会偏见，认为后进区一切都落后，没有可取之处。因此，其流动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日本古代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就是这种状态。

其实，日本自奈良时代以后，将所引进的中国文化消化之后，创造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文化，它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

首先，日本自六七世纪以后，出现了许多文学家、诗人、书法家，他们的作品不断传入中国。就其数量而言，虽然不大，但对中国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不可能没有影响。其次，日本文化对中国的意识形态亦有影响。佛教本是从中国传到日本的，但在日本得到发扬光大，有些高僧来华传道，其高明之处显而易见，对中国佛教产生逆影响。

最重要的是，中华典籍的回流对保存中国文化来说，日本功不可没。中国是天灾人祸较多的国家，许多文化典籍常因各种原因散佚。散佚之后，中国还要从日本抄回或买回某些重要文献。从某种意义上讲，自近代以后，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大于欧美。

中日两国的文化有许多共同之处，都是农耕民族，但由于历史文化发展的不平衡，致使有千百年的先进与落后的差异，但在日本接受了儒学之后，共同之处明显增多。引进佛教，引进汉字的举措表明日本有以中国文化为榜样的倾向。他们在纪年上也使用天干、地支。在季节方面使用二十四节气。甚至连许多传统节日也照搬中国的。这些足以说明日本愿意接受中国文化，但日本文化绝不是中国文化的分支，更不是甘愿跟在后面跑。

日本文化自有其民族特色，尤其是在民族精神方面，不甘落后的进取精神十分强烈。他们古代没有像中国那样的四大发明，近代也没有像牛顿、爱因斯坦、爱迪生等那样的科学家和发明家。但由于他们善于学习，善于钻研，日本的现代科学技术并不亚于任何国家。日本的封建社会起步比中国晚上千年，但通过“大化革新”向中国学习，很快就赶上了中国；日本的资本主义社会比西方晚上百余年，但通过“明治维新”向西方学习，很快就赶上了西方，跨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日本是怎样吸收外来文化，是怎样使

各种不同文化在日本国内巧妙地融为一体，是怎样使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发展成为经济大国，凡此种种都值得人们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去研究和探讨。但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为了强国他们要向外学习先进的东西，为此他们必须先从文化方面入手，他们要大量翻译外国的书籍和文献，这也是使日本成为翻译大国的主要原因。近现代以来，西方国家只要出版了什么比较重要的书籍，不出几个月就会在日本看到日译本。

4

美国历史学家赖肖尔在其研究著作《日本人》中曾这样写道：

“中日两国人民历史上一向是近邻，……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有一个共同的文化背景，因为日本的文化是从中国借鉴来的，正如北欧人民同地中海地区的人民具有共同的希腊——罗马文化传统一样。……这种文化借鉴从7世纪到9世纪期间最为盛行，并一直持续到17世纪。甚至在19世纪初，许多受过教育的日本人仍感到自己是中国文化的子孙。”

——摘自赖肖尔著《日本人》中

译本序言，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日本公众对中国的感情既热诚而又极其复杂。长久以来日本以中国为榜样，因此有一种强烈的钦美和亲近感。日本人非常清楚，他们的文字、词汇、艺术和许多传统的价值观念都来源于中国。中国是他们的希腊和罗马。”

——摘自赖肖尔著《日本人》中译本第462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

赖肖尔的上述评论可以说是恰如其分地指出了中日两国的文化关系。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悠久频繁，影响广泛深刻，成为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由于19世纪以前中国的古代文化，从总体上说，在东方居于领先地位，所以古代中日文化交流，主要是日本向中国学习。因而，中华文化的因素逐步渗透到日本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日本人在学习、接受和吸收中华文化的过程中，根据本民族的传统对其进行改造和再创造，使之成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并且在某些领域内又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似乎可以说，日本对中国文化的学习、接受和吸收，是文化传播与融合的最为成功的范例。甚至可说，在中华文化圈中，日本是在自己的民族文化中移植、吸收

和融合中华文化因素特质最多的一个国家。

应该说，在文化传播与影响中印记最深的是文字和文学。文字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相同或相似的语言文字，是文化传播的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在中华文化圈中的主要国家，如朝鲜、越南和日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都曾长期运用汉字汉文。而在日本，今天仍然在使用着汉字，这说明影响之深刻。汉字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它超越了社会发展阶段和阶级阶层，成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坚固纽带。

汉字渗入日语，由于文法上性质的改变，也就日本化了，成为纯粹的日语词汇，就是说，日本的汉字已不是中国的汉字了。日语中的汉语词汇，有些是从中国输入的，还有许多是用汉字组合创造的，因而有些词义与中国相同，有些只是相似，有些则演变得完全不相干。

日本从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逐步输入和消化汉字，并借用汉字创造出自己民族独特风格的文字，使日本文化得以在一个新的基础上发展。中华民族创造的汉字移植、融合到日本语言中，成为日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日本人吸收中华文化的最大成就。在中日文化的相互交流中，中国人也吸收了一些日语汇，丰富了汉语语文。特别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日本人借用汉字翻译了大量西洋文献，其中也用汉字译出许多术语和名词，例如，“民主”、“科学”、“经济”、“工具”、“电话”、“哲学”、“广告”、“社会”等等。中国人在通过日文翻译西方学术著作的时候，就将这些术语和名词直接搬过来用。这种语汇的不断输入，扩大和丰富了汉语的语汇，也推动了现代汉语的发展。这种日本的汉字语汇对中国的逆输出，也是中日文化交流一种特殊现象。

中国文化对日本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除了儒学和佛教文化，日本的其他学术和艺术领域也都深受中国文化的惠泽，无处不带有中国文化影响的历史印记。

在史学方面，古代日本的修史工作是与中国史书的传入和影响密不可分的。日本的史书都是用汉文写成的，无论在形式上或在思想内容方面都能看出受中国史书的强烈影响。在形式上，他们采用编年体。在思想内容上，他们借用了中国史书中许多宣扬皇帝圣明的文字，贯穿着天皇一家万世一系的思想。同时也反映了儒家的“德治”思想。并混杂着中国的阴阳五行、谶纬思想等等。日本史学的最大杰作是水户藩源光圀倡议编修的《大日本史》。此书前后历时250年，直到1906年才全部完成。《大日本史》共397卷，完全模仿中国的正史。本纪、列传、表、志，应有尽有，汉文也通达顺畅。皆受《春秋》《通鉴纲目》等中国史籍的影响。另外，记述日本军阀历